

王蒙文存

第十七卷



王蒙文存

第十七卷
欲读书结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文存 .17,欲读书结/王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9

ISBN 7-02-004293-7

I.王… II.王… III.①王蒙-文集②文艺评论-文集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020 号

目 录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3)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7)
谁了解毕加索?	(12)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17)
《回娘家》模式的意义	(21)
话说《雨人》	(25)
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29)
作家是用笔思想的	(33)
讲点逻辑	(36)
旧体诗的魅力	(39)
话说“朝三暮四”	(44)
谈学问之累	(47)
懂还是不懂	(55)
东施效颦话语词	(63)
再话语词	(69)
发见与阐释	(73)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78)
空屋及其他	(83)
躁动的“蔷薇雨”	(85)
批评或有之隔	(90)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96)
相声的文学性	(101)
话说这碗“粥”	(106)
“缘木求鱼”	(109)
九死未悔的郑重	(115)
《读书》补	(118)
参古考今	(124)
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	(127)
人·历史·李香兰	(135)
精神侏儒的几个小镜头	(144)
躲避崇高	(148)
概念	
——效用与陷阱	(156)
关于《女人的气味》	(163)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	(166)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172)
心灵深处的对话与冲击	(178)
文学与地理	(181)
“头朝下”漫议	(186)
不争论的智慧	(189)
“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眼睛	(194)
旧梦重温	(202)
不成样子的怀念	(208)
名士风流以后	(216)
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225)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229)
后的以后是小说	(234)
想起了日丹诺夫	(238)

全知全能的神话	(246)
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与陈建功、李辉的对谈	(253)
汉城盛会话东洋	(280)
周扬的目光	(288)
陌生的陈染	(294)
道是词典还小说	(298)
我心目中的丁玲	(306)
嘉言与警句	(318)
难得明白	(326)
咏叹与深思	(335)
永远的雷雨	(339)
绝对的价值与残酷	(346)
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355)
读《大浴女》	(367)

存目(文见本书第十八卷)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时间是多重的吗?

一篇《锦瑟》解人难

再谈《锦瑟》

欲读书者，处于未读书、不读书之狼狈处境而粉饰之谓也。犹清代曾剃头国藩手下大将战太平军，不说“屡战屡败”而说“屡败屡战”。思书而不可读，便成“情结”。不学而不甘无术，便把浅层次的感想见解写出来，求教于善读书多读书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本卷为曾发表于《读书》杂志“欲读书结”专栏的文章。

同聚於縣縣之群聚不，并聚未干後，蓋并聚起
平大群聚大不平聚國兵降曾升聚起 也附之聚起
可下并聚起。”始聚起而“始聚起”則平
聚起聚起聚起，平聚起，平聚起，平聚起，平聚起
聚起，平聚起，平聚起，平聚起，平聚起，平聚起

夫妻怎样才能和谐

偶读一海外华侨报纸,上面译载了一个洋人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提到许多注意事项,如:

1. 丈夫刚下班,切忌向他诉说家中诸事(因此时他太累,兴奋灶还在自己的事务上)。向丈夫谈家事的最佳时机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

2. 丈夫对妻子的打扮不可掉以轻心。她换了发型,换了服装,换了鞋袜,都应引起丈夫的足够兴趣……

笔者读后的第一反应:真琐碎,鸡毛蒜皮言不及义,把爱情庸俗化了。

第二反应:代中国同胞拟问题文章。

你要夫妻和谐吗?首先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使你们双方成为具有崇高目标与共同事业的终生伴侣。其次要树立对己对人对子女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爱情婚姻以严肃的内容。这样便可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对待别人,不可处处自我中心,而要先考虑、先理解对方。第三要劳逸结合,不断丰富与更新共同的生活内容。第四要注意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同样要体贴对方。第五遇到纠纷摩擦不要往窄处想。第六关于财产……

第三反应:中国人愈来愈习惯于从根本上、从整体上、从关键上看问题想问题了,解决问题了。从而找出了许多大道理——叫做纲的,认为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纲是管目的。认为有了大道理就可以

使小问题迎刃而解,举了纲目就一定张。

我所拟的中式夫妻和谐论貌似颠扑不破与洋洋洒洒,实际上有两个缺点:

1. 千篇一律,缺少新意。

2. 可操作性差。这些道理全部通晓的夫妻,仍然有可能吵架打离婚。请看看周围,看看自己,有几对夫妻闹纠纷不是由于“鸡毛蒜皮”而是由于理论论战?

而洋人的议论呢?

1. 确实是琐碎了些。

2. 确实可能有所补益。

3. 小补益加到一起,也有齐家兼利安定团结的大效益。

发挥:不知道是古代的传统还是新中国普及政治学习的功效,中国知识分子为大道理、为动辄的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关键所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太多了?从古代就纠缠于治国平天下、君臣之义、有道无道、独善兼善、王道霸道之辩,有几个知识分子愿意去研究医药、烹调、酿酒、服装、农业机械、手工艺,即清代所极力贬低的天文地理言兵言术的奇技淫巧呢?这是否也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只有混沌一团的大道,而没有分割成彼此独立的学科。无学科哪儿来的科学?解放以后我们的脑筋集中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红与专、世界观宇宙观的辩论上。近几年的热门则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揽子评论,关于现代意识的一揽子鼓吹。谈历史则谈超稳定机制。谈文学则谈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谈理论则谈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造、体系与论点……这些题目好则好矣,必要则必要矣,够用吗?只做整体研究,不做分割研究,还有学科科学吗?如果搞电学的人还必须同时研究电费收取标准,搞采矿的人必须同时精通世界矿工运动历史,还有电学和采矿学吗?全国知识分子都为两三个热门题目大发宏论,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大道理、热衷大道理、争执大道理,在可喜的同时有没

有可忧之处呢？

联想一：一位西德教授告诉我：“我们大学的师生越来越不爱听中国学者的讲演了。他们不论讲什么，都要先大讲一通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辉煌，近代落后，新中国充满希望，又走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出现了新问题。轮到讲自己的专业，却没有什么词儿了。我真不知道在中国学者是怎样接受训练的。”

联想二：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感到奇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一个个高屋建瓴，挥斥遒劲，甚至可以对一个作家一个年头的文学创作发表结论性见解，却未见什么人做一点“笨”的工作。比如，你要评论一位作家，你能不做搜集该作家的生平、著作篇目索引、有关评论研究文章索引的工作吗？

联想三：一些中国的名言、谚语：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其近道也，难矣哉！朝闻道，夕死可矣。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博士卖驴，下笔千言，未有驴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上纲上线。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大河没水小河干……

联想四：中国人写信封也是从大到小，国、省、市、区、街、号、人。而美国人写信封次序正好反过来。如给《读书》某编辑写信，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张编辑，读书编辑部，166号，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我简直觉得这匪夷所思。后来再看他们写的信封，倒觉得对象鲜明突出。再有，美国店员找钱也是先找硬币零头，再找个位上的元，再找十位上的元的。

联想五：我们做报告的格式也是：

1. 国际形势。
2. 国内形势。
3. 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基本精神。
4. 我们对此精神的拥护与体会。
5. 本地区要做的事。
6. 本单位要做的事。

联想六：笔者下放农村时，上级派工作干部来动员多售余粮，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农民听得不耐烦，便说：“别绕圈子啦，到底允许我们留多少口粮，你就实说吧。”

一点结论：笔者无意抹煞由大及小、由高及低、先务虚后务实的思想方法、论证方法、表述方法的价值及优越性，但大小总是互相作用的，纲目、虚实、概念与表象总是互相作用的。小河没了水，大河也同样会干。材料不翔实，必然会带来议论的粗糙。缺少分割的、相对独立的、剥离的学科研究，大道理有可能变成空谈清谈。大道理没闹通闹透，也仍有可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情。例如一个服务人员，闹不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也仍然可以改善服务态度。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呜呼！未敢苟同也。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据悉,在著作完成六十七年以后,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终于得以在自己的祖国苏联公开发表。我国出版的《当代苏联文学》一九八八年第四期译载了这篇一九二四年即用英语出版了的作品。其实,早在两年前,此书即以作者“萨姆雅丁”的译名,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是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反面乌托邦,大概是指它们描写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不是理想化的自由幸福的乐园,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不是人类的美梦,而恰恰相反,这种乌托邦的特点是它的反人类性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是被控制被扭曲被扼杀了的人性,是严密的社会组织与先进精巧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并从而形成的对人类的恶性统治。

反极权,是三本书的不谋而合的主题。西方所谓的反极权概念里,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和暗示,包含着哪些合理的忧虑与或有的不着边际的偏见,本文暂不涉及。至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所可能生发的负面的影响,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否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理论也就不会提出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政权和国家的消亡的命题,我们也不必面对和探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了。

重要而有趣的是反面乌托邦的概念本身。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

乐观主义,乃至把这种历史乐观主义简单化——变成简单机械的历史进化主义。即简单地认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叫做“芝麻开花节节高”,把历史看成一个攀登高峰的跋涉,经过的时间愈长,爬得就愈高。因此,畅想未来就是我们用来鼓舞情绪的良方。在渴望现代化、痛感处境落后的今天,我们更是恨不得一个跃进、一个起飞就能摆脱过去进入未来。我们认定,未来是解决了今天困扰我们的一切矛盾的极乐世界,未来意味着肯定的进步和幸福,过去意味着一片黑暗而现在的意义在于通过牺牲和奋斗迎接未来。

而反面乌托邦的思路则提醒我们,未来也可能是坏的,今天的一切未必事事胜过昨天,而明天的一切也未必事事强似今天。技术的日益先进,社会秩序的高度规范,优化原则的普遍贯彻,社会机制的高度效率化,都可能反过来变成人类的对立物,都可能使人变成技术、秩序、效率的控制物与牺牲品。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各有特色而又大同小异地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图景。

《美丽新世界》里,纪元二五三二年的人类是由“中央伦敦繁育暨制约中心”来培育的,这个中心的工作原则即“美丽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共有、划一、安定”。“九十六个划一的孪生子,操作九十六架划一的机器”,而且,他们正在创造由“一个卵巢”“生产”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孪生子的新纪录。就是说,由于机器和工作的统一化,为了效率,必然要求人的统一化,因此科学家用人工方法使用一个卵巢的卵子与来自同一精巢的精子交配,产生同一类型的人。这真可怖!作者把这个二五三二年称为“福特纪元”六三二年。所谓福特纪元,是把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创立生产流水线的年代定为新纪元的开始,其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含义是很明白的。

在《一九八四》里,则写到一九八四年生活在一个超级大国里的人民。他们的电视机兼有接收电视广播与监视它的观众两方面的功能。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统一的监视之下。其结果是人人必须戴上假面,隐藏自己,讲假话。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写的,里面把一九八

四当做反面乌托邦成为事实的时间。当然,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了,地球上还没有发生那样可怕的事,但这种戴假面讲假话的气氛的描写并不令人感到陌生,并不令人感到作者在阴郁、悲观、病态以及反苏狂热之外没有严肃的警世思考。

在《我们》里,生活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王国”的第一千个年头的人们,被编成了符号和数码。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婚配和做爱,都是按照“王国”的无所不包的时刻表通知单来进行的。在那时,“号码”(即人)们回忆“在博物馆中见到的图景:那是二十世纪祖先们的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辆、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听说过去确曾是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看,扎米亚京笔下,我们现在的混乱的苦恼重重的二十世纪,倒成了一千年后的号码们的不敢相信其当真存在过的“向后看”的“乌托邦”了。

三部小说的共同倾向包含着对现代化的极端焦虑。工业化、合理化、优选化、标准化、统一化等等,会不会在带来效率、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经济起飞的同时,也带来对人生、对人性、对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的幸福的某种戕害呢?三位作家以相当夸张乃至乖戾的语调做了肯定的回答。虽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文学家天生会有一种想入非非的、脱离实际的、追求绝对个性与自由而非组织、非秩序、非社会的倾向;但这些书的描述、这些回答仍然既严肃又沉重,既刺激人的神经又引人思索。即使从整体上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们的枭鸟式的预言,我们仍然有必要耐着性子去读一读、想一想,从中得出清醒的、更有远见的结论。

他们对未来的不祥感与噩梦感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们着重从人文主义的、文化的、性灵的、有时是审美的观点来批判工业文明,批判现代化,批判城市文明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这里,生产力

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民的全面幸福。这种观点相当杀风景,相当令人不快,然而却不能忽视并一笔抹杀。经济的起飞只有和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涉及人们的各自的灵魂的精神因素的改善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进步。在这里,现代观念或现代意识恰恰不意味着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无条件认同,不意味着对传统、对昨天的无条件的决裂——像我们的一些由于对太不现代化的焦虑而产生的对一切现代生活方式及其符号的倾心膜拜者那样。我们的这些膜拜者太像幼稚的少女了,她们急于离开家园,投入自己远未认知的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模式的怀抱。

三部作品中尤使中国读者可能感受新意的是他们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批判。不论在“一九八四”年、“美丽新世界”还是“统一王国”纪元一〇〇〇年,科学技术起的是恶的作用,是摧毁人性和控制人的作用。这真惊心动魄!它们反映了人们特别是西方的人们对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的疏离感、异己感,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作者幻想二十世纪的一千年以后第一艘宇宙飞船升空进入宇宙。在这一方面,当今科学技术达到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作家的幻想。科技愈来愈近乎无所不能了,而对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个人生活、家庭婚姻生活与内心生活,人们仍然是这样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感到无能为力。一边是无所不能,一边是无能为力,这样巨大的倾斜,能不造成小说家的噩梦——反面乌托邦吗?能不造成对科技的异化的警惕感吗?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面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果真是泾渭分明、火车道上的两股岔吗?一些美善至极的乌托邦,会不会带来或同时包含着负面的契机呢?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清醒的提问吗?

在中国谈这些也许为时尚早。我们正苦于生产力不发达、劳动效率不够高与科学技术不够进步。我们当然要坚持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历史主动精神,努力奋斗争取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然而,前车之

鉴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乐观主义应该是清醒的乐观主义。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应该是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并注意解决新的问题的现代化。更深刻更全方位地思考一些问题,获得更多的远见和更多的深思熟虑,也许不能说干脆用不着。

1988年12月写于厦门